

# 到处都有生活,为何还需深入生活

做人民的学生

□杜学文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历史的发展进步源于人民无限的创造力。文学艺术的发展繁荣同样得益于人民创造历史的生动实践。当艺术作为一种独立形态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时,就已经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与人的劳动、生活密切相关的品格。据研究,岩画应该是今天能够看到的最早的艺术品实物。大约距今一万年前的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岩画,被誉为“东方天书”。这些石刻的岩画中有人像、日月、星象、禾苗等内容,以非常抽象、质朴的手法表现了农业部落先民对土地、造物神、天的崇拜意识,是当时人民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的艺术表达。瓷器出现后,人们在上面描绘了鱼、鸟、花等图案,亦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与这些动植物之间的密切关系。

## 感受更为丰富、博大的社会生活

我国较早讨论艺术生成原因的著作《礼记·乐记》中就写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一论述的关键是“心”与“物”的关系。心是人的内在世界,受物之作用。物是一种外在存在,作用于心。而音,主要是音乐,或者也可以是艺术的代表词。其出现,是由于人的内心受到了外在“物”的触动之后表现出来的。这就是所谓心感于物的意思。《诗大序》就艺术的表现形态作了很生动的描绘,它说诗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嗷叹之;嗷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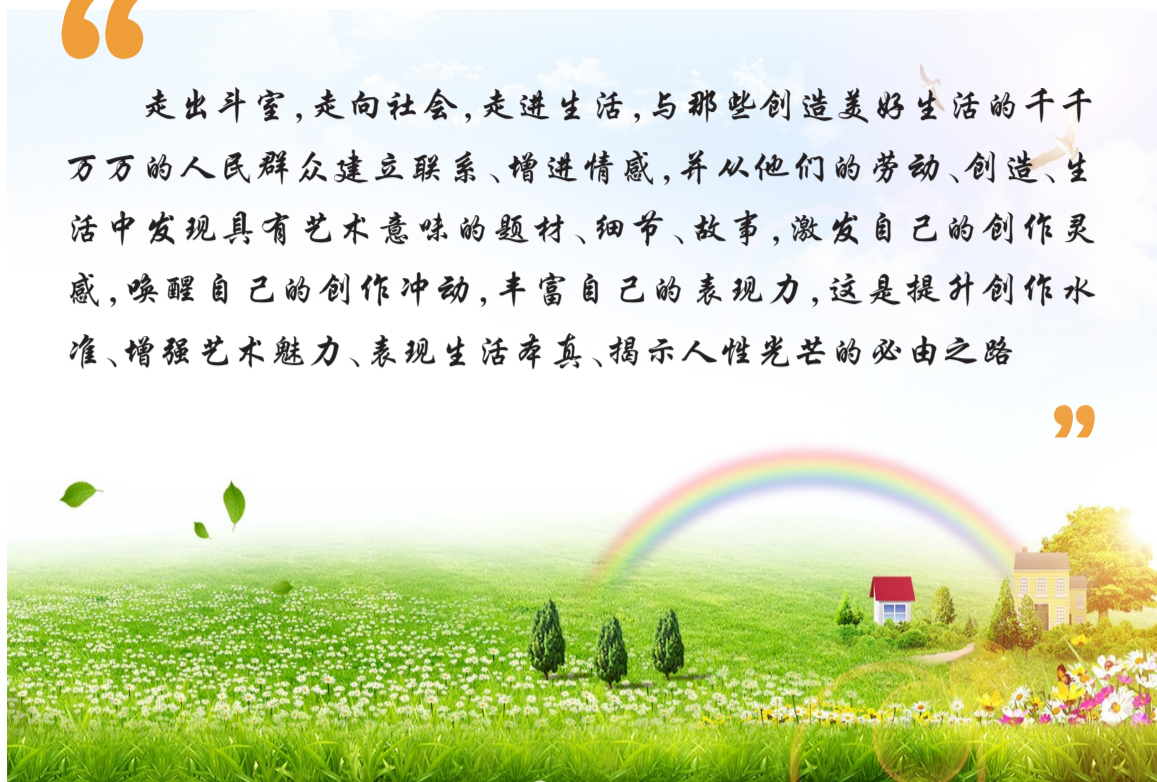
这些论述都强调艺术是人的内心情感世界的外化表达,但也特别强调了这种内在情感世界的出现是由于受到了外在“物”的触动,正所谓“物使之然也”。这里的“物”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既有宇宙星空、山河大地、花草树木、飞鸟虎豹等自然形态的存在,更有人类的行为等社会形态的存在。《诗大序》特别指出,所谓的“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所谓的“雅”,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所谓的“颂”,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尽管今天我们对这些说法并不一定完全接受,但其中讨论的艺术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却是不能否认的。这就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去深入思索:作为创作者,如何才能了解、感受到更为丰富、博大、具有本质意义的社会生活,并以艺术的手法将之表现出来?

我们当然不会否认作家与艺术家可以通过阅读、交流得到启示。每个创作者也有自己的生活圈,可以得到许多信息。也有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出作品,甚至是不错的作品。不过,我们也会注意到,就创作而言,仅仅保持这样的生活状态还是不够的,特别是想要持续进行创作是非常困难的。

首先,创作更强调具体性,而不是抽象性。它是通过对具体的人物、事件、性格、细节、语言的描绘来吸引欣赏者的。如果缺乏生动具体的表达,过于显现出抽象的概念化特色,就会消泯艺术的鲜活,消损其艺术魅力,就会雷同于理论研究等其他的表现形式。艺术的这种具体性,要求创作者要更多地感受形形色色的、更为细致生动的生活形态,而不可能仅仅依靠那些简单的、间接的、充满局限性的东西。

其次,创作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情感的活跃度与人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在与各种各样的人接触、交流、碰撞之中才能唤醒蛰伏在创作者内心深处的情感波澜,形成创作的冲动。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虽然居于书房、围于日常也在情感,也会产生情感的波动,但与深入生活之后所获得的情感相比较,两者的状态是不同的,强度也是有差异的,背后的原因更是不一样。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冲动,即使能够唤起创作的灵感,这种状态还是不能够持久也还是需要打问号的。

再次,艺术创作需要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提取适宜表达的内容,并转化为艺术。没有生活的底蕴,缺乏生活的积累,很难表现出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深刻性。也许有人会说,我就喜欢表现花鸟、山水,并不需要与人接触,这难道不是创作吗?这个说法貌似正确,却忽略了你是如何来表现这些物象的。假如你



家里有一盆花,是不是你的创作就仅限于这盆花呢?你是不是要创作神态各异、姿态多样的各种各样的花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要观察、了解更多的花呢?是不是要突破自家花的局限来接触更多的花呢?更重要的是,每一盆花的背后,牵扯着一个鲜活的人物和事件。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为每一个创作者都准备了极为生动、丰富的素材,就看你是不是能够发现,有没有从生活而来的灵感。

因此,走出斗室,走向社会,走进生活,与那些创造美好生活的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建立联系、增进情感,并从他们的劳动、创造、生活中发现具有艺术意味的题材、细节、故事,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唤醒自己的创作冲动,丰富自己的表现力,这是提升创作水准、增强艺术魅力、表现生活本真、揭示人性光芒的必由之路。

## 社会生活给文学创作带来丰富滋养

创作者要善于从纷繁多样、活色生香的人民生活中发现并表达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不断加快,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急速的变化。从直观的层面来看,人们会感觉到城市的扩张、建筑的现代、农村的振兴、交通的快捷、生活的便利、文化的兴盛等等。而这只是一种表象的改变,其深层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如农村,种植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的劳动方式主要依靠单纯的人力,现在出现了机械耕作、科技种植、集约化产业链、电子商务等更具现代性的生产方式。新的产业形态、企业结构、管理模式等不断出现。相应地,人口的流动性空前地增加,传统的伦理关系受到了冲击,新的社会阶层也逐渐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劳动主体,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些新现象、新变化,与我们曾经熟悉的生活方式有着极大的不同。因而,我们就应该从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实践中学习、了解、把握时代变革带来的生活变革,以及这种变革中蕴含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增强民族复兴的自信心。

创作者应能怀着为民之所乐而乐、所忧而忧的人民情感,感受并表达出中华民族的价值选择。从根本上来讲,创作是一种情感活动。仅仅“知道”人民生活的丰富多样还只是完成了创作的第一步,是创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要从这种生活中体验人民群众的真实情感,并从这种情感的流露中把握背后之所以如此的价值选择。人民群众爱什么、恨什么;为什么而欣喜、为什么而忧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不仅仅是一种情感形态,更重要的是其中也蕴含着价值选择。创作者不仅要感受到这种情感,也要从这种情感中发现并捕捉其中的是非曲直与价值追求,并表现在自己的创作之中。郭店楚墓中的竹简就记录了古人对艺术的认知,说:“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

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就是说,人的情感表达有教化的功能。这种功能就是人内心的情感能够表达出“德”,即符合自然社会运行规律的价值情感形态。所以我们在人民的情感之中可以提升净化自己的情感,并在这种提升与净化中表现出符合人民意志与愿望的价值选择。

要在斑斓多姿、各具特色的人民创造中塑造现代文明转化进程中中国人的时代形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典型。在中华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品格。只有深入人民的生活,才能更加真切、具体地感受到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中人的努力与奋斗,以及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各具光彩的精神个性。虽然面对的问题不同,采取的办法不同,每个人的性格神采也不同,但积极向上、改变自己、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念是共同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只有与更广泛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发现他们人格的动人之处,把握他们的性格特点,并以艺术的手法塑造出具有时代意义与个性特色的新人形象。正是现实生活中丰富多样、性格不同的人物为我们提供了素材、原型,才打开了创作的艺术闸门,使创作者感受到了活生生的人物性格。那些具体的、特别的、富有个性的人就成为艺术表现的形象库,使我们有可能会塑造出具有本质意义的艺术典型,成为代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形象。

深入人民群众的生活,在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进程中汲取生活的滋养,开阔艺术表现的视野,提升作品的精神境界,这是文学艺术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前不久中国作协在湖南益阳组织的“作家活动周”中,王蒙先生结合自己的创作实际作了一场生动的报告。他特别就《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这边风景》等作品,谈及生活对自己创作的启示。他认为,做人民的学生,在生活中深造是他从事创作最深刻的心得。老一辈作家中,赵树理、柳青、周立波、马烽等长期坚持在基层生活,甚至离开京城到农村扎根,建立自己的生活点,参与到当时的农村建设之中,与老乡一起劳动,一起生活,一起讨论,积累了丰厚的生活素材,感受到了人民群众最真实具体的情感形态。他们不仅关注农村的发展、农民的生活,自己也身入其中、心入其中、情入其中,成为农民中的一员,是老乡的邻居、隔壁的大哥、交心的朋友。在他们的笔下,人物是鲜活的,富有个性与典型性的;情感是真挚的,是能够体现时代精神并融入人物的;内容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表现了生活本质的,因而也是具有现实深度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在文学史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是因为与人民群众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并从中汲取到了丰厚的滋养与动力。

(作者系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向来有一个不成文的“鄙视链”,即研究古代文学史的瞧不起研究现代文学史的,而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又瞧不上研究当代文学史的。抛开其立论的合理性和严谨性不谈,仅就这一说法的形成逻辑来看,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之所以处于“鄙视链”的最底端,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古代文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研究要比当代文学研究有着更为悠久的学术传统和更加自觉的史料意识。且不说考据、义理、辞章这些基础性治学方法之于古代学人的重要意义,仅仅是针对鲁、郭、茅、巴、老、曹等现代文学名家的史料性研究论著就数不胜数。更遑论“红学”“鲁学”这两门显学分别在古代文学学科和现代文学学科各自占据的地位与权重。相比之下,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则由于多方面掣肘性因素的惯性制约与干扰而在史料研究方面显得有些相形见绌。对此,程光炜教授早在2008年就曾在《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一文中指出,“当代文学”已有近六十年的历史,它的“历史化”亟需被提上日程,而这种“历史化”应该避免将当代文学史研究再次“批评化”,同时警惕“认同式”研究而强调一种有距离和有分寸的研究。这是一项需要建立在丰富的当代文学史料基础上的长期研究任务。

当然,作为一名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从业者,笔者并非是在妄自菲薄,更不敢无视或否定当代学人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方面所作出的突出贡献。相反,程光炜教授对于“问题”的发现恰恰意味着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意识的普遍觉醒与广泛普及。自新时期以降,随着当代文学学科的建制与完善,中国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同步展开,不仅催生出洪子诚、甘阳、汪晖、陈晓明、陈思和、蔡翔、吴秀明、程光炜、王尧、王彬彬、陈建华、陈顺馨、黎之、黎辛、李辉、黄子平、贺桂梅、李扬等一大批杰出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者,同时也产生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八十年代文化意识》《文坛风云录》《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等诸多有分量的当代文学史料研究论著。此外,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贯彻实施,中国与世界逐渐接轨,西学大量涌入,阐释学、现象学、精神分析学、文学社会学、知识考古学、文化谱系学等理论学说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方式方法,报刊、讲话、稿签、日记、书信、便条等纷纷被纳入到学术研究视野,钩沉、考辨、补遗、释义等更是成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常规操作。

然而,在学术成果层出不穷的背后,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的一系列相关性困境、歧途和弊端也随之暴露出来。

首先,是重“学”(学术)而轻“思”(思想)的现象。诚如洪子诚教授所言,近些年来,研究者的史料意识不断加强,“当代文学”的史料搜集工作得到充分重视,但也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厚此薄彼”倾向,即很多人认为史料研究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无涉,学术研究无需具备必要的思想深度,甚至在当代文学学科内部产生了新的“鄙视链”。对此,王尧教授亦在以“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料问题”为题的学术报告中呼吁,当代学人,特别是年轻学者应重温《论语》中的“学”与“思”的辩证法,努力实现“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之间的有机结合。

其次,是偏“史”(史料)而废“文”(文学)的现象。在学术界内部有一个基本共识,即文学史问题,尤其是当代文学史问题单纯通过分析文学自律性层面上的审美诸要素是无法得到有效且合理的解答的,因此当代文学研究“向外转”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以至于一些人片面地强调理性经验之于“史料”研究的意义与价值,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文学”本身的审美体察与主观感悟。为此,王彬彬教授在以“问题意识与史料运用”为题的讲座中号召,青年学人在进行史料研究的同时,不能放弃对文学理论的研读以及对语言文字的真切感受。

另外,是有“方法”而无“问题”的现象。洪子诚教授在《问题与方法》一书中明确指出,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方法是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所探寻的恰切的路径,失去了问题的导引和方法的观照,将无法建构起学术理色彩突出的学术洞见。由此可见,问题与方法是不可偏废其一的。然而,当下的一些史料研究者往往只专注于“方法”的花样翻新,而在“问题”的探索上动力不足,致使许多学术成果沦为乏善可陈的“无用功”,不过是挪用一些西方时髦理论去印证中国文学史上早有定论的旧观点。有鉴于此,2022年南京多所高校、科研机构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研究生学术论坛就将主题明确设定为“新问题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史料研究”。朱晓进教授更是在致辞中着重强调了“问题意识”之于史料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发现新问题是进行学术创新的必要铺垫,探究新问题是史料研究有所突破的重要契机,而文学研究之中对新问题的解答必须要有文学史料做有力支撑。”

针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需要重新审视和反思“史料”与“当代”“文学”以及“中国”的交互关系。强调史料研究的“当代性”在于突出“当代文学”学科内部“问题”的特殊性及其“研究”的独立性;强调史料研究的“文学性”旨在期待一种学术范式上的“视界融合”,即努力实现知识社会学与文学审美学之间最大程度上的互补与统一;而强调史料研究的“中国性”则是呼唤在顶层设计上建构起真正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唯有将“中国”“当代”“文学”同时对象化与问题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才能迎来新的学术突破与发展。

(作者系河北师大文学院博士生)

#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存在哪些问题

□赵振杰



(上接第1版)

书展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策划推出了“文学City Walk·上海站——2023上海书展隐藏款”活动,多位作家、学者在直播间与数万读者分享新书。围绕《那间街角的茶铺》和《历史的微声》的写作,以及历史研究与文学写作的关系等话题,王笛和许纪霖进行了深度而轻松的对话,引起线上线下读者的广泛兴趣。陈平原介绍了自己的最新散文集《中文人的性格、才情与命运》,书中学人都是作者所亲近和敬仰的中文系教授们,以北京大学为主,兼及中外学界,书中还插入50幅图片,与相关文字互相支撑,形成对话。莫砺锋的《宋诗鉴赏》将宋代文学大家及他们家喻户晓的诗词作品带给读者,在选目上以选见史、精中选精,文本校勘上注重版本、字斟句酌,注释鉴赏上要言不烦、透彻易晓,处处体现出作者深厚的文史学养。

“上海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我们有幸见证这里的生活,确实是一种特殊的经验。”8月19日,孙甘露携作品《千里江山图》与读者见面,这也是该书在上海面向公众读者举办的第一场活动。小说以1933年的上海为背景,打捞了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用文学的方式去想象和呈现它的过程。孙甘露表示,这部书的书名具有多重含义,“既有字面意思,在书里也是行动计划的代号。从回望历史的角度来看,《千里江山图》不仅仅是一幅画,它还寄托了中国人对家国、民族、历史包括艺术的感情”。小说虽然是虚构的,但背后也有一段可歌可泣的真实历史,“它比小说写到的要丰富、精彩得多”。

“电影都是骗人的,你不要学电影,你要学生活。”摄影师、导演杜可风首部随笔集《漆中之黑》分享会同日举行,书中集结了杜可风90篇灵动幽默的“电影笔记”、130幅珍贵照片及

# 书香满沪上 文学唱主角

其拼贴作品,记录了他40年的电影生涯,其中既有对自己如何从零出发、一步步成为摄影大师的经历记述,也有他从业多年沉淀下来的感悟与思考。活动期间,杜可风谈道:“我是不看电影的影迷,书才是我最好的朋友。书是属于你自己的空间,让你自由地去想象、去感受,书本中有无限可能。”

8月20日,“路内追随系列”新书发布会举行,作家路内与走走、李伟长、张诗扬一起与现场读者展开交流。“追随三部曲”是路内的成名作,由《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三部曲构成,并于2018年出版番外短篇集《十七岁的轻骑兵》。作品总体量70余万字,多达240余位人物穿梭其中,构成一部城镇青年的成长史。走走表示,《少年巴比伦》展现了当代文学中一个“守望者”的形象,路小路是留守者,是戴城的守望者,也是青春年代的守望者。

同日,评论家潘凯雄携新书《直言》来到上海书展,与读者进行分享。《坦率》《直言》是潘凯雄自2016年起在《文汇报》开设的“第三只眼看文学”个人专栏合集,其中《直言》对当代62位作家、63部文学作品展开评述,对象既有长篇小说,也有研究著述、散文集、非虚构、中短篇小说等,所涉作家既有业已蜚声文坛的大家名家,也有成长中的文坛“新人”。活动现场,潘凯雄直言不讳:“现在的书评,很多都太‘油腻’、太‘甜’。有些作品当然值得‘甜’,但很多作品是五味杂陈、酸甜苦辣都有,不能只说甜。很多人都抱着‘你好我好大家好’的态度,以‘和’为贵,要说一点作品的真话是很难的,但这件事总得有人去做。”

上海书展期间,中信文艺举办了一系列文学活动,16位作家、23场阅读沙龙、1场“文学与影视”创作者交流工作坊等,构成了中信文艺系列活动的整体风貌。其中作家蒋一谈、唐克扬、辽京、吕晓宇携作品参与本届上海国际文学周,与中外嘉宾一起分享对作品的思考。

《小丑岁月》是蒋一谈的首部科幻小说集,书中作品均以机器人作为切口,在未来图景中铺陈思辨色彩,将人文关怀鲜明融入充满“硬核”设定和雄奇想象的科幻领域。唐克扬在《洛阳劫》中回望历史,想象北魏洛阳最后的光彩,置身如星般灿烂绚烂的洛阳幻境,在历史轮回中聆听普通人的叹息。辽京在小说集《有人跳舞》中由动物视角的叙事开篇,以机器人的反抗收尾,用关乎时间、空间和人性的叙事,进入现实的纵深处。吕晓宇的首部长篇小说《水下之人》以现在和过去两条并行的时间线交织叙事,融合口述、访谈、自白、时事评论等多种形式,讲述一个陌生人“消失”和“进入”的始末,书写出一代青年的狂想曲。

8月18日、19日,中信出版联合上海图书馆东馆开启“全民阅读基地”共建项目文学系列第二季——“青年创作者计划”系列沙龙,12位作家和学者、媒体人一起,开启主题为“青年,以肉身进入世界”的6场系列活动,通过线下分享、线上直播的方式联结作者与读者,共同探讨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写作、当代中国的城市书写等话题。中信出版还与SMG尚世影业合作,举办“文学与影视:创作者交流”活动,18位作家与12位制

片人一起面对面交流,呼应本次上海国际文学周“叙事共同体”的主题。

随着电视剧《小敏家》《熟年》的热播,作家伊北及其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伊北近年来的写作以长篇小说居多,重在聚焦当代都市生活中的热点和痛点。8月19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文化艺术出版社和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共同举办伊北《娃儿》首发式。小说借由“孩子”这个小切口,一方面以女主角代桂莲的生活时空为横轴,描绘小人物的市井生活,另一方面通过她母亲亲邻空灵妹妹三人的生命轨迹,反映数十年间人们人生观念、生活方式的微妙变化,构建起个体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故事脉络。首发式现场,伊北回顾了自己的写作初衷,分享了小说创作中的苦乐。

8月22日,新蕾出版社举办了“童话故事里的写作游乐场——王一梅图书分享会”,儿童文学作家王一梅结合自己的童话新作《离星星最近的地方》和“玩转作文”书系,分享了她在自然与生活中快乐写作的秘诀,并向孩子们展示了“作文地图”的神奇魔法,教现场的小朋友怎样用“作文地图”来写文章。她从“一粒种子”开始画起,从种子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到迎来田鼠、蚯蚓、小鸟,一个关于“等待与陪伴”的故事主线也就有了。王一梅又从观察、想象、情感等方面,告诉孩子们怎样将绘制的画面精彩地落于笔端,从而让写作更加开阔动人。她表示,家长应该带孩子多走进自然,让孩子好好去观察身边的风景,记住风景中的美好。

经过近20年的精心打造和探索发展,上海书展业已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和美誉度的大众书展之一。它早已融入市民大众的生活,成为一座城市最美的风景,向上海乃至全国读者展现了文学出版行业的新姿态、新气象。